



清人选诗总集研究丛书

马卫中／主编

魏强／著

清人选唐诗研究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乙卯秋
魏强
于金陵

三

清人选诗总集研究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础项目(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重大项目“清人选诗总集研究”(项目编号: 11JJD750016)最终成果之一

清人选唐诗研究

马卫中 主编

魏 强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人选唐诗研究 / 魏强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7. 8

(清人选诗总集研究丛书 / 马卫中主编)

ISBN 978-7-5672-1972-4

I. ①清… II. ①魏… III. ①唐诗—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1336 号

清人选唐诗研究

马卫中 主编

魏 强 著

责任编辑 金振华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地址: 镇江市黄山南路 18 号润州花园 6-1 号 邮编: 212000)

开本 787 mm×960 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68 千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1972-4 定价: 40.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总 序

有清一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中兴时期,诗歌创作非常繁盛,成就亦十分辉煌。我国著名文史专家钱仲联先生在讨论到清代诗歌的地位时曾经说过:“清诗作家在总结明代复古逆流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继承发展前代遗产的实践中,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社会现实的土壤上,开出了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①由于清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繁荣,清人编选诗歌总集亦蔚然成风。清人选诗总集数量之众和传播之广,既为清代诗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亦堪称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一大奇观。

《隋书·经籍志》有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摯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摭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②可见,总集是文学作品繁荣的直接产物。总集既是供人阅读的典籍,又是文学批评的特殊形式。孔子删订《诗经》,确定了诗歌总集的经典意义。此后,选诗成为中国诗学史上保存、学习、总结、接受、传播诗歌创作成就的重要手段。清人所选诗歌总集保留至今者,达数千种之多。表现类型亦呈现多样化:从所录诗人年代看,既有通代之集,又有断代之集;从收录诗人籍贯看,既有全国之集,又有地方之集;而从收入诗人性别看,甚至有专门的妇女之集。清人编辑诗歌总集的优势表现在其传播范围和影响上,所谓“选在一室,而风行乎十五国;选在一日,而观感夫千百年”。^③由于出版业的发展,较之前朝,清代的书籍印刷和发行更为方便,致使刊行的诗歌别集,多至汗牛充栋,令读者目不暇接。为了让更多的诗人诗作能够广泛传播,就需要有人做筛选的工作。诚如顾嗣立所云:“自唐以前,诗无刻本。其所传

① 钱仲联《清诗简论》,《梦苕庵论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6页。

② 魏征等《隋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89—1090页。

③ 丁灏《诗乘序》,刘然辑《诗乘》卷首,清康熙刻玉穀堂刻本。

者,大抵皆才人妙笔,纸贵人间,故所存少而工者多。自宋以后,刻本盛行,易于流布,连篇累牍,工拙并陈,其势必出于选而后可传。”^①当然,清代诗歌总集,因其多方面的价值,造就其巨大的影响力。鲁迅先生即云:“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各家的专集之上。”^②因此,我们说清人所编诗歌总集是清代诗学的渊薮,为清代诗学、清代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材料支撑,其重要价值记述如下。

一、文献保存价值

清人有着强烈的文献征存意识,编纂诗歌总集则尽量博收旁采,使片羽吉光得以流传后世,故一般都会要求总集的编辑做到“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③。顾嗣立编辑《元诗选》时曾云:“元遗山先生《中州集》之选,寓史于诗,而犁然具一代之文献。钱牧斋先生《列朝诗集》,盖仿《中州》之例而变通之者也。独有元之诗阙焉未备,故窃取前人之意,编成十集,非敢效顰遗山,亦以一代文献所关,不可泯没云尔。”^④而康熙有感于“自昔唐人选唐诗,有殷璠、元结、令狐楚、姚合数家,卷帙未为详备。至宋初,撰辑《英华》,收录唐篇什极盛,然诗以类从,仍多脱漏,未成一代巨观”,于是“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诸编,参互校勘,搜补缺遗……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厘为九百卷。于是唐三百年诗人之菁华,咸采撷荟萃于一编之内,亦可云大备矣”。^⑤保存文献是清代操选政者的普遍观念,如曹庭栋云:“窃考唐人诗集,则《钦定全唐诗》至精至备。元则秀野顾氏之选,明则朱竹垞辈,先后摭辑,亦云盛矣!”^⑥吴之振、吕留良等人纂《宋诗钞》亦然,其《凡例》有云:“虽稗史、杂录、地志、山经、碑板、家乘所有,无不据摭。”他们甚至期盼“同志有得,亦望录贻”^⑦。因此,《宋诗钞初集》的出版,得到了后世学人的充分肯定,如《四库全书总目》称“之振于遗集散佚之余,创意搜罗,使学者得见两宋

① 《元诗选凡例》,顾嗣立《元诗选》卷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页。

② 鲁迅《集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③ 永瑔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85页。

④ 《元诗选凡例》,顾嗣立《元诗选》卷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页。

⑤ 《御制全唐诗序》,曹寅等《全唐诗》卷首,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页。

⑥ 曹庭栋《宋百家诗存序》,曹庭栋《宋百家诗存》,清乾隆六年(1741)曹氏二六书堂刻本。

⑦ 吴之振《宋诗钞初集凡例》,吴之振《宋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页。

诗人之崖略,不可谓之无功”^①。晚清叶德辉亦赞其“网罗散失,一朝文献,赖以得传”^②。这些都主要是肯定了吴之振等人辑存文献的功劳。可以说,清人所编辑的诗歌总集具有明显的保存文献意识。

清人所编总集还多附有诗人小传,可以补史料之亡。王士禛曾辑选《感旧集》,其生前并未刊印,仅有稿钞本传世。至乾隆年间,卢见曾为其所收录的三百三十余人补传并刊刻。因此,卢氏补传本的价值不言而喻。又梁善长编纂《广东诗粹》,其《例言》云:“至高人逸士、羽客缁流,及闺阃之秀者,则间详其轶事,以补缺略。”^③故《广东诗粹》中不乏记录诗人生平事迹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大都是正史不载或鲜为人知者,其史料价值亦不待言。而《南州诗略》是一部县级的地方性诗歌总集,主要收集清代南州,即今安徽当涂之诗人诗作,其例言亦曰:“先达名儒、高人逸士,有见即录。至身没无传,郡邑志不及载者,必多录数章,以志阐发幽微之意。”^④集中辑录南州诗人,大多为名不见经传者,这对于保存地方文献具有重要价值。

一些诗歌总集尚存有阅读者所撰写的题跋,这对于理解总集内容、版本流变、刊刻过程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冯舒《怀旧集》有谢国桢《访〈怀旧集〉记》一则,乃作者阅览苏州市图书馆所藏清初抄本所撰,跋文记录了该书的传播概况。又北京图书馆藏姚佺《诗源初集》,其凡例后有陈昭《至日偶作》诗一首,自注“时录诗源”。此书又有“石耳山人跋”,记述了是集初刻本传播情况。诸如此类的题跋,往往偶见于某部总集中,属于罕见资料,颇有文献价值。

当然,由于多种原因,清人编选诗歌总集时,也会误收他人诗作,如《国朝诗别裁集》卷十五末“无名氏”《题壁》二首之二,实为宋代秦观《泗州东城晚望》。又如程嘉燧卒于崇祯十六年(1643),也就是清军入关的前一年。其诗歌在清初影响颇大,被清人视作“枕秘”,以至于《感旧集》《清诗铎》等都将其当作清人诗歌收录。因此,作为清代诗学的重要文献,诗歌总集所录诗人和作品需要辨识。同样,总集所载诗人小传,亦须考订出入。

① 永瑔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63页。

②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③ 梁善长《广东诗粹》卷首,清乾隆十二年(1747)达朝堂刻本。

④ 《南州诗略例言》,朱滋年辑《南州诗略》卷首,清乾隆刻本。

二、诗学批评功能

“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①的诗歌总集,一般来说,具有“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②之功能。清人所编诗歌总集,亦折射出了特定时期的诗学思潮。诗歌总集关于诗人作品的取舍安排,既表现出选家的诗学观念,又反映出所选诗人及其作品在不同时期的接受和传播情况。它“广泛涉及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各个范畴,包括文学的界定及其本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分期与变化的概念、文类的概念及其与个体作者间的关系、评价的标准和它对诗人的命运的影响以及阐释的模式”^③。因此,清人编纂的诗歌总集具有诗学批评的功能。

首先是引导文学发展的方向,促进诗歌风尚的演变。清初诗坛承明末余绪,江南引领着全国诗风,其霸主地位由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等先辈诗人的社会地位和创作成就所奠定,而《云间三子诗合稿》《怀旧集》《太仓十子诗选》等诗歌总集的问世,为云间、虞山和娄东等江南诗派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稍后,王士禛倡导神韵,沈德潜强调格调,除有诗话著作宣扬其诗学主张外,亦均辑选诗歌总集以规范创作。王士禛编有《神韵集》《唐贤三昧集》《十种唐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感旧集》等,以标榜其“神韵说”。他在《唐贤三昧集序》中明确提出:“严沧浪论诗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司空表圣论诗亦云:‘妙在酸咸之外。’康熙戊辰春杪,归自京师,居宸翰堂。日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于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录其尤雋永超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为《唐贤三昧集》,厘为三卷,和《文粹》《英灵》《间气》诸选诗,通为唐诗十选云。不录李、杜二公者,仿王介甫《百家》例也。”^④沈德潜以《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确定学古之诗学途径,又以《国朝诗别裁集》引领当时之诗学祈向。即便到了晚近,同光体诗歌风靡海内,陈衍之《近代诗钞》,既是学宋诗人集结之大纛,亦是学宋诗风弘扬之标杆。由此可见,清代诗学贯穿始终的学唐与学宋之争,在清人所编辑的诗歌总集中有明显的迹象可寻。

① 永瑔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85页。

② 鲁迅《集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③ 余宝琳《诗歌的定位——早期中国文学的选集与经典》,《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乐黛云、陈珏编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

④ 王士禛《唐贤三昧集》卷首,清康熙刊本。

诗歌总集是诗歌得以传播、接受并发生影响的重要途径。因此,通过编纂诗歌总集来建立和壮大流派,这是诗学理论家们的又一个重要目的。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开宗和立派,是封建士大夫在文化和学术领域最高的追求境界。诗歌总集体现了编辑者一定的倾向和诗学观点,一些总集还构建了完整的诗论体系,主要是通过辑选、评点作品来阐明、弘扬某种文学观念,本身即含有“批评”的意味。正如庞德所说:“我赞成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展示,百分之二十的喋喋不休……对批评家作评价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挑选,而不是根据他们的空谈。”^①清初诗人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吾炙集》等来引导清初承袭晚唐和宋代的诗风。其在《列朝诗集》中梳理明诗流派脉络非常清晰,对明代七子、公安、竟陵及闽中、关中、云间等诗风皆有不满意,其不满前后七子及闽派、云间派因模拟蹈袭而失去自我面目;而对公安、竟陵,则是不满其鄙俚。钱谦益针对明诗之弊,力在拯救诗道,强调诗人自成一家,自出手眼,因此提出了“人其诗”与“诗其人”的问题:

古云诗人,不人其诗而诗其人者,何也?人其诗,则其人与其诗二也,寻行而数墨,俚花而斗叶,其于诗犹无与也。诗其人,则其人之性情诗也,形状诗也,衣冠笑语,无一而非诗也。^②

钱谦益论诗受程嘉燧影响甚深,《列朝诗集》中将程氏推为松圆诗老,并揭示其学诗路径:“孟阳之学诗也,以为学古人之诗,不当但学其诗,知古人之为人,而后其诗可得而学也。其志洁,其行芳,温柔而敦厚,色不淫而怨不乱,此古人之为人,而古人之所以为诗也。知古人之所以为诗,然后取古人之清词丽句,涵咏吟讽,深思而自得之。久之,于意言音节之间,往往若与其人遇者,而后可以言诗。盖孟阳之诗成,而其为人已邈然追古人于千载之上矣。”^③由此看来,《列朝诗集》的编纂是钱谦益辈传播其诗学思想的重要路径。正如清人龚丽正云:“一代之中,而择数朝焉;一朝之中,而择数人焉,或择数十人焉;之十数人中,而人择数章焉,斯之谓‘择’。”^④甄别去取,乃是一种重要的批评实践,选家藉以达到阐扬其文学主张之目的。

清人所编诗歌总集的诗学批评功能,除了表现在引导风尚的“选诗”方面外,

① (美)韦勒克《现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章安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② 钱谦益《邵幼青诗序》,《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34页。

③ 钱谦益辑,许逸民等点校《列朝诗集》丁集,中华书局2007版,第5373页。

④ 龚丽正《宋诗选序》,《宋诗选粹》卷首,清道光五年(1825)瑞实堂刻本。

还在其序跋、体例、评点和诗话中都有体现。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序》中就对明代诗坛作了总结,并提出了复古的诗学主张。他认为:

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而二百七十余年中,又有升降盛衰之别。尝取有明一代诗论之:洪武之初,刘伯温之高格,并以高季迪、袁景文诸人,各逞才情,连镳并轡,然犹存元纪之余风,未极隆时之正轨。永乐以还,体崇台阁,馥馥不振;弘、正之间,献吉、仲默,力追雅音,庭实、昌穀,左右驂靳,古风未坠。余如杨用修之才华,薛君采之雅正,高子业之冲淡,俱称斐然。于鳞、元美,益以茂秦,接踵曩哲。虽其间规格有余,未能变化,识者咎其鲜自得之趣焉;然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自是而后,正声渐远,繁响竞作,公安袁氏,竟陵鍾氏、谭氏,比之自郅无讥,盖诗教衰而国祚亦为之移矣。此升降盛衰之大略也。^①

三、诗歌教化功能

诗歌的教化功能,特别是通过编纂总集而加以强化和突出,是从孔子选《诗三百篇》就已经确定的。遵循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和核心价值观,清代朝野文人,凡守儒道者,都为诗教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清史稿·文苑传序》云:

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论者欲特立“清学”之名,而文学并重,亦足于汉、唐、宋、明以外别树一宗,呜呼盛已!明末文衰甚矣!清运既兴,文气亦随之而一振。谦益归命,以诗文雄于时,足负起衰之责;而魏、侯、申、吴,山林遗逸,隐与推移,亦开风气之先。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圣主贤臣,莫不以提倡文化为己任。师儒崛起,尤盛一时。自王、朱以及方、恽,各擅其胜。文运盛衰,实通世运。^②

由此看出,清代文风首先是钱谦益等的倡导,再由魏禧、侯方域、申涵光、吴嘉纪及其他明遗民的推波助澜,加之清廷的文化政策,共同形成了清代“文教大昌”的局面。我们姑且不论魏、侯、申、吴是否都属于山林遗逸(其中侯方域参加过顺治年间的乡试,并取得科名),而这种时局的形成,确实为强化诗教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清人编辑的诗歌总集中可以窥见。如果说编辑《御选古文渊鉴》《四库全书》

^①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序》,《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②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14—13315页。

《佩文韵府》《今古图书集成》等是“圣主贤臣，莫不以提倡文化为己任”的精彩表演，而《全唐诗》《御选唐诗》《佩文斋咏物诗》《御定历代题画诗》《御定千叟宴诗》等总集的编纂，其目的则是规范诗歌创作、强化诗教作用，至于是否真正“提倡文化”，并且“文教大昌”，只能是见智见仁了。

诗歌的教化作用，统治阶级似乎更为重视。如康熙《佩文斋咏物诗序》云：

然则诗之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即一物之情而关乎忠孝之旨，继自骚赋以来，未之有易也。此昔人咏物之诗所由作也欤！朕自经帷进御，覃精六籍，至于燕暇，未尝废书，于诗之道，时尽心焉。爰自古昔逸诗，汉魏六朝，洎夫有唐，迄于宋元明之作，博观耽味，掇其菁稂，撮其菁英。命大学士陈廷敬、尚书王鸿绪校理之，翰林蔡升元、杨瑄、陈元龙、查昇、陈壮履、励廷仪、张廷玉、钱名世、汪灏、查慎行、蒋廷锡编录之，名曰《佩文斋咏物诗选》。盖搜采既多，义类咸备，又不仅如何者所云虫鱼鸟兽草木之属而已也。若天经、地志、人事之可以物名者，罔弗列焉。于是镂板行世，与天下学文之士共之。将使之由名物度数之中，求合乎温柔敦厚之指。充诗之量，如卜商氏之所言，而不负古圣淳复诂训之心，其于诗教有裨益也夫。^①

这里，康熙在突出“诗教有裨益”的同时，又强调对事物的认知作用，如其说“盖搜采既多，义类咸备，又不仅如何者所云虫鱼鸟兽草木之属而已也。若天经、地志、人事之可以物名者，罔弗列焉”，是以达到温柔敦厚的诗教作用。诗歌的认知教育，在陈邦彦所编《历代题画诗》中有进一步体现，康熙帝《御定历代题画诗序》在讨论绘画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后，更谈到了题画诗的教化作用：

而能搜抉其义蕴，发摅其旨趣者，则尤藉有题画之诗。历代各体题咏以万计，散置诸集，无所统纪。翰林陈邦彦裒辑汇钞，得八千九百余首，分为三十类，编次一百有二十卷，缮本呈览。朕嘉其用意之勤，命授工部侍郎。兹刊成，装潢来上，万几余暇，时一披阅。凡两间之名象，庶类之禁错，无不该载于中。且不逾几席而得流观山川险易之形，近在目前而可考镜往代留遗之迹，以至农耕蚕织，纤悉具陈；鸡犬桑麻，宛然如睹。庶几于昔人《豳风》《无逸》之图，有互为发明者焉。夫图绘，艺事也，而近于道。题

^① 《御制佩文斋咏物诗序》，陈廷敬等《佩文斋咏物诗》卷首，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本。

画,诗之一类也,而通于治。杜甫诗谓:“绘事功殊绝,幽襟兴激昂。”读是编者,可以触类而知所务矣。^①

所谓“题画,诗之一类也,而通于治”,可见清统治阶层对诗教作用的高度重视,这也是他们倡导编纂诗歌总集的根本目的。

清人编辑的普及性诗歌总集更能体现诗教作用。孙洙的《唐诗三百首》可谓其中代表。此选本的辑选者孙洙不以诗歌闻世,其编选目的也较为简单,即“为家塾课本”。然从诗歌总集接受史看,其自康熙以后,迄于今天,一直是最受人们喜欢、也是刊刻版本最多的总集。据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统计,《唐诗三百首》在清代的版本就超过五十种。之所以出现这种独特的现象,与《唐诗三百首》“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②的辑选标准有关,其以唐诗文化的集成性而成为经典总集,“屡经翻刻”,并“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③,成为雅俗共赏的唐诗读本。

没有诗歌的启蒙教育,就不会有诗歌普及。同样,没有写诗的功利追求,也就没有诗歌繁荣的表象。清代著名诗论家吴乔《答万季野诗问》谓:“事之关系功名富贵者,人肯用心。唐世功名富贵在诗,故唐世人用心而有变。”^④唐代科举考试有所谓试律诗,而宋代至清初,科举考场上是没有诗赋的考试内容的。康熙晚年曾想改革科举,其内容之一就是后场“减判增诗”。消息传出,为学写试律诗,仅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一年之中,编辑出版的唐人试律诗选注本,今所及见者就有《唐人应试六韵诗》《唐诗类释》《唐诗筌蹄集》《唐诗排律》《唐五言六韵诗》等。乾隆二十二年(1757),试律诗终于回到科举考场,于是,诗歌又成为士子步入仕途的敲门砖。清人除了编辑前人的试律诗总集外,还大量编辑当代人的试律诗来指导应试写作,如《庚辰集》《我法集》《馆课存稿》《复初斋试律说》《同馆诗律汇钞》《今雨堂诗墨》《七家试帖》《本朝应制琳琅集》《本朝馆阁诗》《国朝赓飏集注》《国朝应制诗粹》《馆律分韵初编》《七家诗贴辑注汇钞》《国朝馆选录》《九家试帖》等。此类诗歌总集类似我们今天的高考复习资料中的作文精选,其阅读面之广,或者说影响读者之深者,是其他诗歌总集所无法替代的。

① 《御定历代题画诗序》,陈邦彦等《历代题画诗》卷首,《四库全书》本。

② 孙洙《唐诗三百首序》,《唐诗三百首》卷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③ 四藤吟社主人《唐诗三百首补注序》,《唐诗三百首补注》卷首,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页。

④ 吴乔《答万季野诗问》,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

四、文化承传功能

诗歌总集作为一种典籍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诗歌总集的出版发行,发挥着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吴嵩编《名家诗选》,其《凡例》有云:“近日廊庙有和雅之音,名山多藻丽之什。所当广为哀辑,以彰风雅。”^①可见,选编总集,寄托着文化推广和传播的目的。选编者总是希望按照他们的理想和标准,能借助反映时代风貌和时代心声的诗歌,将时代的文化精神发扬光大并传之千秋。而周在都所作《名家诗选序》则云:“扬固东南一大都会,为汉唐宋旧墟。董子之流风,教思未泯;欧公之余韵,德泽犹存。而四方之贤士大夫,高人寓公,日月有至。登平山者,发怀古之音;问竹西者,构情深之句。稽之往古,每多高文大篇,光诸典册。近者翠华临幸,睿藻辉煌,山隈海澨,莫不响风慕义,沐浴咏歌,鼓吹风雅,为太平韵事。”^②可见,诗歌总集的文化传承功能在地域文化的传播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诗歌总集的编纂与地域文化的重视是互动的。在清代,对地域文化的重视,推动了诗歌流派的繁荣。地域文化被强调的标志,是方志与家谱的修纂。表现在诗歌领域,则是地方性总集的选编。我们现存的地方性诗歌总集,十之八九为清代所编,且多有官方的参与,至少是衙门的倡导。当时,各省有各省的总集,如《国朝山左诗钞》《两浙辘轳录》《国朝山右诗存》《江苏诗征》《国朝畿辅诗传》;各府有各府的总集,如《国朝杭郡诗辑》《徐州诗征》《国朝湖州诗录》《津门诗钞》《淮海英灵集》;各县有各县的总集,如《东皋诗存》《梁溪诗钞》《国朝松陵诗征》《海虞诗苑》《青浦诗传》;甚至一乡一村也有总集,如《梅里诗辑》《贞丰诗翠》。地域性诗歌流派因之探到源头,并不断远播。而清人杨彭龄《畿辅明诗序》亦云:“斯集之所以辑也,或曰遗天下而独勤其乡不广,或曰僻远非力所及。以余观之,二者之论似之而非也。诗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一草木之微且不敢忽也,况先生长者之言乎哉?古之君子称其里必曰父母之邦,仁人孝子思父母则并思父母所游处,情之至也。”^③由上可以看出,诗歌总集的文化传承功能表现在辑者强烈的收集和保存地方文献的意识之中,即“情之至也”。

胡世安序《扶轮新集》,谈到了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导致人文环境的差异,因

① 《名家诗选自序》,吴嵩《名家诗选》,《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② 周在都《名家诗选序》,吴嵩《名家诗选》,《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杨彭龄《畿辅明诗序》,王崇简编《畿辅明诗》,清顺治十六年(1659)刻本。

而在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上表现出地域文化的悬殊,其云:

两间仁义之气,结而为山,融而为水,发脉溯源,靡不载。西北以訖东南,有自幽向明之象,山由鸿庞之秀。越水始泛,觞卒望洋,其势也。起伏曲折,坟衍支条,其因也。于是乎,秩而岳渎,别而岛洲,私秘而丘壑池沼,奇幻而瀑波崛峻。千情万状,莫可殚究,皆天地大文也。选胜者,去取异衡,兴感殊致,乌有定哉?因是而知十五国之风,未能强同。即一身阅历,先后不相傅会,亦其势之攸趋。性情不得不受变,而欲以我法引绳,杂籀叶准,不戛戛其难与?①

所以,地域性诗歌总集记载了地域文化的历史传承,也彰显了地域文化的独特价值。

在清代,相当一部分地域性诗歌总集不仅关注乡邦诗人诗作,还辑收和本地相关的诗人诗作,建构起人文区域观念。部分诗歌总集,专设流寓、方外、闺秀,多有寄居、驻锡、嫁入者诗作入选。也有对此类人不作专设,而径自收入者,譬如王应奎《海虞诗苑》。是书便收录了流寓和移籍常熟的诗人,其《凡例》云:“是集所选,不及流寓,而前辈如王西涧、张无闷两公,同学如梅圃、侯君,并徙居吾邑者四五十年,以訖于没,而子孙又皆占籍于此,故即入之邑人中。”“方外之诗,固以本邑为主,其有薙染在他方,而生长在本邑者,则仍选之。又本非邑人,而移锡在此,以至终老者,则亦选之。”②郑杰《补订闽诗录凡例》亦云:“原录于土著、流寓、名宦,杂驛一处,而宫闱、闺阁、道士、释子之类,亦未分析,今不录。名宦、流寓者另编于各集之末,而以仙神、鬼怪、杂歌谣之类。”③除了选人以外,选诗的标准,同样也会照应区域的文化特点,故《海虞诗苑凡例》即云:“所选之诗,苟有关于邑中山川、风俗、人物、事迹者,即诗仅平通,亦必节取。庶于古人采诗之义,或不甚刺谬云。”④所以,地方性诗歌总集,往往堪作全面了解这一地方风土文化的教科书或参考书看待。

从一地出发,追寻文化根基,传承文化传统,体现了辑选者深远的人文关怀。这种桑梓之情怀还体现在题咏唱和诗歌总集的编辑之中。《南宋杂事诗》辑选者用诗加小注的形式来展示南宋百余年间杭州之风貌,既是一部反映南宋杭州史事的咏史诗集,又是一部彰显杭州地域文化的诗歌总集,这无不体现了辑选者的文化

① 胡世安《扶轮新集序》,黄传祖《扶轮新集》,清顺治十六年(1659)刻本。

②④ 《海虞诗苑凡例》,王应奎《海虞诗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53页。

③ 《补订闽诗录凡例》,郑杰《闽诗录》卷首,清宣统三年(1911)刻本。

承传的担当。再如《岭表明诗传序》亦云：“况上自缙绅隐逸，下及流妓青衣，悉谱其声歌，裒然成集，可不谓难乎？惜传述无人，不能家弦户诵，间有一二为之编辑者，亦觉采择未精，桑梓中余韵遗风，几莫有从而问焉者。则风流将消歇矣。”^①

当然，清代的诗歌总集还有很多价值，而要求我们在一篇序中将其穷尽，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列举的这些价值，已经说明了我们所做的工作的必要性。其实，这也是我们撰写《清人选诗总集研究丛书》最早的动因和坚持的动力。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我2010年前后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他们入学伊始，我就萌发了让学生通过系统研读清人所编诗歌总集，促使其对中国古代诗学、特别是清代诗学的深入学习和了解，进而对清代诗歌总集作一个全面研究的构想。四位同学分别以清人所选唐、宋、明、清诗歌总集为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对象。同时，通过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我们以“清人选诗总集研究”为课题，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并获批。所以，本丛书从确定撰写到推进完成，凝聚着我们师生共同努力的心血，今天得以面世，更是复旦大学古代文学中心诸位先生、特别是黄霖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倾情关照的结果。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业师钱仲联先生即请黄霖先生来参加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光阴荏苒，几十年来，黄先生一直鼓励我、提携我；当然更多的是帮助我、教育我，深情厚谊，我终身受益，也终身难忘。

应该简单介绍一下《清人选诗总集研究丛书》的大致情况。

本丛书凡四种，分别为《清人选唐诗研究》《清人选宋诗研究》《清人选明诗研究》《清人选清诗研究》。丛书通过文献的搜集、梳理、研究，进而对清人选诗总集之形式和内容等的分析，勾勒出清人辑选唐、宋、明、清四个朝代诗歌总集的概貌及其诗学批评关系、文献价值等。由于近年学界对清代所编诗歌总集的研究更加重视，渐成热点，堪称显学，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述已经不少，所以，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另寻角度，发前人之未发，言前人之未言。也正因为如此，四部著述的体例、结构有所不同，各有侧重，各具特点。具体如下所述：

一、魏强《清人选唐诗研究》。本书主要分析了清人选唐诗的特征，并通过选择《唐诗鼓吹评注》《唐诗三昧集》等个案，来研究清人的诗学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清代唐诗选本的历史发展，综论清人选唐诗基本情况及其

^① 吴炳南《岭表明诗传序》，梁九图、吴炳南辑《岭表明诗传》，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

兴盛的原因。第二部分从政治、经济、文人心态、思潮等角度对清代唐诗选本与清代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分析了清人唐诗选本的政治性、文化性和对唐诗接受的引导性特征等。第三部分通过钱谦益《唐诗鼓吹评注》编辑特征的探析,分析了明清易代之际的唐诗选本与诗学思潮的关系,以厘清其编纂意义及影响。第四部分通过王士禛《神韵集》等的编辑背景和选人选诗所表现的诗学倾向的分析,探究了王士禛的神韵说。第五部分通过《唐诗别裁集》的选诗背景、沈德潜的诗歌生涯、盛世之歌温而厚等三个方面的探析,研究了沈德潜的格调说。

二、高磊《清人选宋诗研究》。本书以七十余种清人选宋诗总集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与批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清人选宋诗的动因及其主要特征,梳理宋诗总集与唐宋诗之争之间的关系。具体内容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时间纵向为轴,勾勒了宋诗选本发生、发展、兴盛、衰落的演变轨迹,并力图揭示其发展演变的规律。第二部分从回应诗争、弘扬诗教、指导初学、辑存文献等方面探讨了清人选宋诗的动因。第三部分从稿源的多样性、编刻时间及地域的不平衡性等方面探讨了清人编辑宋诗选本的主要特征。第四部分从清代初期、中期和晚期编辑的宋诗总集特征分析,观照了清代的唐宋诗之争。第五部分通过考察《宋诗钞》的成书过程、版本、影响等,论述了吴之振的宋诗主张。第六部分选择个案研究作为补充,考论了《宋诗类选》的编者家世、学术思想、编选体例、征引书目等问题。

三、尹玲玲《清人选明诗研究》。本书通过文献资料的调研、梳理,理清清人选明诗总集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探析明诗选本的诗学批评功能,突出史与诗两个特点。具体内容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清人选明诗概况,包括时间地域分布、体例特征、价值以及选本流传概况。第二部分通过明诗总集对节义的褒扬、明代历史的反思以及时代色彩对选诗的影响等方面,论述明清鼎革之际选编者在选本中所表达的故国之思。第三部分通过对明三百年诗歌运势的梳理,评价公安派、竟陵派及明地域流派的特点,分析清人对明诗的扬弃。第四部分以时代为序,选择较有影响的《明诗评选》等总集,分析清人对明诗复古的评价与反思。第五部分通过《列朝诗集》等四部总集的个案研究,在明诗评点基础上探索诗学。第六部分通过《明三十家诗选》等个案分析,说明清人选明诗所反映的清人对明诗复古的接受。

四、刘和文《清人选清诗研究》。本书以所经眼的三百余部清人选清诗总集为研究对象,概括清人选清诗的特征,并在清前期、清中期和清后期的诗学背景下总结三个时期的清诗总集编辑特点及其诗学批评特征,且选择能代表三个时期编辑特点的诗歌总集,研究其文献价值。具体内容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清诗总集的

文治功能、繁多种类和阶段特征等三个方面总结清人选清诗的概貌。第二、第三、第四部分,主要抓住清代诗学学唐与学宋的纷争,以时间为主线,在清初期、清中期和晚清时期分别选择《感旧集》《国朝诗别裁集》《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等总集,考察和分析了不同时期的清诗选本之特征,这些特征既表现在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的差异方面,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风云际会。第五部分选择《南州诗略》等三部不同时期的诗歌总集作为专题研究,考察它们的文献价值,同时也窥测其时代特征。

总之,《清人选诗总集研究丛书》比较系统地、有代表性地研究了清代所编纂的诗歌选本,较为宏观地把握了清人选诗总集的概貌特点、诗学思想和文献价值,考察了清人选诗与清代诗学的关系。唐宋诗之争是清代诗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对清人选唐诗和清人选宋诗的研究,分别从唐、宋诗选本的角度切入,考察这一延续了几百年的诗学命题,以管窥其编撰与诗争之间的关系。清人选明诗的研究,其着力点在探讨清人对明诗或复古、或创新的批评态度,以及明诗选本对清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清人选清诗的研究,主要讨论清诗选本与清代诗歌理论发展和创作变化的关系,推演清代的诗学思潮。本丛书各册之间既具有一定的联系性,又不乏相对的独立性,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清人选诗总集中所载诗人小传等资料、所蕴诗歌创作活动等记录、所刊诗歌批评之诗话等内容,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目前尚未充分开发利用,本成果拓宽了清诗的研究空间。因当初曾定下原则,所有选本非经眼者不得纳入研究对象,因此,其文献的可靠性毋庸置疑。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在我看来,学术著述的撰写,和烹饪还真有相似之处。烹饪需要原料,需要佐料,撰写学术论著则需要文献,需要资料;原料需要前期制作,而文献需要考订核实,佐料等需要挑选,资料也必须有所取舍;烹饪需要厨师的手艺,撰写学术论文则需要作者的修养。而更重要的是,高层次、高水平的厨师和作者,其面向食者和读者的情怀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食者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品尝水准,对同一厨师做出的同一道菜,也会有不同的喜好,并有不同的评判。正如英国谚语中说的,一个人的食物,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毒物(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我们今天呈现给读者的本套丛书,不知读者有何评价。我们在忐忑中期待着。

马卫中

2017年夏至日序于姑苏城内风云一片楼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明以前唐诗总集编选情况简述	(2)
第二节 清人选唐诗总集概述	(11)
第二章 清人选唐诗总集的特征	(21)
第一节 清人选唐诗总集鲜明的政治性	(21)
第二节 清选唐诗总集清晰的文化性	(38)
第三节 清选唐诗总集编选对唐诗接受的引导性	(56)
第三章 《唐诗鼓吹评注》与钱谦益的诗学观	(73)
第一节 《唐诗鼓吹》的特殊之处	(75)
第二节 《唐诗鼓吹笺注》与钱谦益的诗学观	(81)
第四章 王士禛编选唐诗总集与神韵说	(89)
第一节 《神韵集》是王士禛神韵说的发轫与本色	(90)
第二节 《唐贤三昧集》是神韵说的转变与成熟	(103)
第三节 《唐贤三昧集》与神韵说在清代的接受	(122)
第五章 《唐诗别裁集》与格调诗学	(146)
第一节 “升平盛世”的社会形态——《唐诗别裁集》编选背景	(147)
第二节 悲喜人生——沈德潜的诗歌生涯	(164)
第三节 《唐诗别裁集》——格调论新篇	(175)
参考文献	(194)
后 记	(200)